

中国

ZHONGGUO
DANGDAIGUANYUAN
DEXINLIJIANKANG

当代官员的
心理健康

刘东超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当代官员的心理健康

刘东超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官员的心理健康/刘东超著. —2 版.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35-3593-8

I. 中… II. 刘… III. 领导人员-领导心理学-
心理学分析-中国-现代 IV. D6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8937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三河丰华装订厂装订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 8.375

字数: 211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7.00 元

责任编辑 王彩琴
封面设计 翟永莲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张志军

序

在当代中国社会，党政官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社会各个层面的管理者、协调者，是重大社会任务的组织者、指挥者，是各项社会公共资源的掌管者、支配者。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较大社会责任的承担者。这样，他们本人素质结构的优劣就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相当的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公共问题、社会问题。在当前对官员各项素质的考察、评议中，知识、能力、品质等受到公众和组织人事部门广泛的关注。这当然是应该和必需的，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亟须引起广泛关注，那就是官员的心理素质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在其整个素质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整体素质的动力结构和运作基础，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素质发挥的功效及其实践活动的成败。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其心理素质自然会深刻地影响到其领导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的生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员队伍中曾经出现过各种问题，从工作不力、效率低下到违规乱纪、贪赃枉法等等，不一而足。究其原因当然有能力低下、品质不良、政治水平不高、制度约束无力等多方面因素，但还有一个因素经常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官员的心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当代官员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多多少少都和他们的心理素质不佳有关，而在有些官员身上、有些问题中，心理原因所起的作用还相当关键。下面我们分三个类别来讨论在官员身上所出现的心理问题。

一是一些官员的心理中有某些不稳定因素，这就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偶尔会产生一些轻微的不适心理或有害心理，比如焦虑、暴躁、脆弱、沮丧、抑郁、恐惧、紧张、疏忽等。这些心理状况有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有时会很快消失，但一般不至于成为长期的病症，尚未达到心理学中所说的偏差心理的地步。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人们的心理素质中有不稳定因素是自然的、正常的，在多数人身上都有这种情况。但对常人来说，这些不稳定的心理因素一般只对他本人和家庭产生一些轻微的影响，而不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危害。对于党政官员来说就不同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由于当代社会政治领域的过分复杂和激烈竞争使许多官员感受到较大的心理压力，这使他们的心理比常人更容易产生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拥有较高地位及掌握较大权力，这些不稳定心理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从而造成工作损失甚至社会损失。比如，在一些不顺心的事情造成的暴躁心理支配下，可能会做出包含盲目成分的决断，从而导致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中的损失。再比如，由于受到批评而心情抑郁、情绪低沉，以致在决断时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从而错失一些有利时机。在某些官员渎职失职的事件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不适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另外，这些不稳定心理因素由于某些特殊机缘的触动，有时会产生不可想象不可预料的结果。比如，据香港媒体报道，2003年5月22日，香港政府物料供应监督梁汉铭跳十七层楼自杀。主要原因便是心理压力过大，他心理承受能力又有些脆弱。据说他最近与上司关系不太和睦，工作压力又大，同时还面临被裁员的可能，造成他情绪十分低落、经常失眠，接受精神科治疗也没

有明显好转，最终落了个悲惨的结局。对于这些不稳定心理因素对社会和官员本身带来的危害亟须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是极少数官员的心理中包含病态因素，在某些个别官员身上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心理偏差，已经达到了心理疾病的程度。实际上，上文第一类中所举的那些不适心理一旦恒常化，并造成对于环境的局部适应障碍，就是心理学所定义的变态行为。对于这些官员的心理疾病已经有了一些报导，只不过尚未引起普遍的关注。比如：广东省一位女性副市长为了紧紧拴住自己的情人——某个有妇之夫，在自己五十多岁的时候还极力利用公款“扮靓”，引起路人侧目；为了阻止情人去看他病中的妻子，竟然在大街上长时间吵闹不已；甚至还用公款买长焦距照相机、雇用侦探来探查情人的行踪。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开纠缠行为。从心理学上看，这位副市长身上已经出现了反社会的人格异常现象，已经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可以想象，具有这种心理状况的官员不可能做好领导工作。果然，这位女性副市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心本职工作，最后由于贪污公款而被判刑。我们说，虽然像这位副市长的情况并不多见，但由于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就会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此保持清醒的意识。

三是一些相对较为正常的心理现象却在某些官员身上畸形发展，导致了某些工作偏差甚至犯罪。比如，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贪心和欲望，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们将自己的贪心和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不会给自己和别人导致不良后果。可是在某些官员身上，其贪心极度膨胀，其欲望无限地放纵，驱使自己走上了犯罪道路。王宝森、李乘龙、戚火贵、陈同庆、朱胜文、孟庆平、徐建设、杨前线、慕绥新、马向东、胡长清、成克杰、张二江、王雪冰、李嘉廷等人之所以长期贪污受贿，最终步入监狱甚至走上断头台，并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显然是其贪婪之心、纵欲之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原广西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是其中

最为典型的例子，在从1991年至1996年的五年时间内，他非法聚敛的财富达1000多万元，几乎是日进万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长期贪污受贿竟然形成了强劲的贪婪心理惯性，以至于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受贿，他就会产生空虚感，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于是，便情不自禁地主动打电话给一些有求于己的人，暗示他们行贿。在此，畸形发展的贪婪心理是其严重犯罪的巨大动力。而这一动力不仅将他本人推上了断头台，而且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再比如，许多人都有自作主张的情况和心理，只要这种心理倾向不是太强，一般也不会导致太大的问题。但是，一些领导官员由于长期掌握权力，养成了自作主张的心理惯性，极少数官员进一步发展到独断专行甚至专横霸道的地步。陈希同、慕绥新、戚火贵、李乘龙、李真、严文耀、杨立峰、王新康等都是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甚至多次将个人意见强加给组织，有时竟然将个人转换成组织的化身。结果对工作、对社会、对人民都造成了巨大危害，并最终导致了其本人的犯罪。另外，像侥幸、冷漠、疏忽、冲动、将就、退缩等心理只要在官员身上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都会导致大大小小的问题。

上面这三类情况告诉我们，心理问题对于党政官员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官员本身的工作和前途，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事业。因此，官员心理问题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术界和政界都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此的研究和思考更是少得可怜，仅在一些文章和论著中零星地有所涉及。很显然，对比起当代官员心理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些零星的涉及是远远不够的。为此，我们拟对这个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但是，无论在研究基础还是在材料获取上，都有诸多困难摆在面前，我们今天能做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做得好些而已。

下面我们就本书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予以交待。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心理”是就广义而言，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官员的感觉、知觉、情绪、信仰、观念、意志、情感、欲望、潜意识、性格倾向、思维特点、整体人格等心理的多个方面。而且，我们不仅研究这些方面的形式层面，还研究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内容层面，后者更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不仅采用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方法，而且更多地采用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尤其是我们还采用各个学科汇通之后的综合方法。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当代官员心理现状，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给出可行的调治方法。从这些方面着眼可以看出，本书进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心理学的研究，而是宏观把握、理论反思与社会生活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将要进入的是一个前人较少探索的领域，收集和整理材料也是我们一项不得不做的重要工作。

其次，我们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中国当代”一词的概念。“中国”一词当然是指我国版图内的所有地方，虽然港澳台官员不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但仍然会随文有所涉及，本书主要考察的是大陆的党政企官员。“当代”一词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今天的二十余年的时间，也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时代。而我们之所以这样使用当代一词，自然是考虑到这是一个新的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区分出来的时期，至少就今天人们的生活感觉来说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的是，本书将较多地考察当代官员心理中的负面内容，也就是某些病态和问题，并提出某些适用的解决之道。这是因为考虑到本书的现实价值及本书材料的情况。对于当代官员心理中的正面因素和积极内容，我们当然也进行研究，但由于这些方面多表现为正常的情况，所以我们着力略少些。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中国当代社会和官员心理分析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对官员心理的影响 (2)

 一、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简说 (2)

 二、当代政治变迁和官员心理交互作用 (4)

 三、当代政治变迁对官员心理的良性影响 (7)

第二节 当代中国经济变迁对官员心理的影响 (17)

 一、当代中国经济变迁 (17)

 二、当代经济变迁对官员心理的良性影响 (18)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化变迁对官员心理的影响 (25)

 一、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简说 (26)

 二、当代文化变迁对官员心理的良性影响 (28)

第四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官员心理的影响 (33)

 一、中国传统文化简说 (33)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官员心理的良性影响 (35)

第二章 当代官员健康心理

第一节 当代官员健康心理举例 (46)

 一、责任意识 (46)

 二、服务意识 (50)

 三、原则意识 (55)

四、忧患意识	(58)
五、清廉意识	(63)
六、实干意识	(68)
七、长远意识	(75)
八、良心	(77)
第二节 当代官员健康心理分析	(80)
一、类型分析	(81)
二、社会和逻辑层面的分析	(83)

第三章 当代官员不健康心理

第一节 当代官员不健康心理举例	(87)
一、贪婪意识	(87)
二、玩忽意识	(95)
三、邪情	(100)
四、迷信	(109)
五、专横	(113)
六、纵欲	(117)
七、攀比	(123)
八、虚伪意识	(127)
第二节 当代官员不健康心理分析	(135)
一、类型分析	(135)
二、状况评估	(140)

第四章 当代中国腐败官员的心理轨迹

第一节 当代中国腐败官员心理轨迹举例	(143)
一、贪财型腐败官员的心理轨迹	(144)
二、财色双取型腐败官员的心理轨迹	(163)
第二节 当代中国腐败官员心理轨迹分析	(196)
一、当代中国腐败官员心理轨迹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196)
二、如何截断腐败官员的心理轨迹	(200)

第五章 当代中国官员心理问题的调治

第一节 党的三代领导关于干部（官员）思想修养的 论述	(205)
一、毛泽东的有关论述	(206)
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	(210)
三、江泽民的有关论述	(214)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心理调治意义	(217)
一、儒学思想对当代官员心理调治的作用	(217)
二、道家思想对当代官员心理调治的作用	(227)
三、佛教思想对当代官员心理调治的作用	(230)
第三节 近现代心理学中的心理调治方法	(234)
一、音乐疗法	(235)
二、家务疗法	(236)
三、宣泄疗法	(237)
四、放松疗法	(240)
五、心理咨询与治疗	(246)
后 记	(255)

第一章

中国当代社会和官员心理分析

从本质上说，人的心理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虽然有时这种反映采取间接的形式，以远远不同于社会本真面貌的形式来表现。不过，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对一个社会的整体来说是可以成立的。这里的关键是不要把反映理解成简单的“照镜子”式的完全相似过程，而应理解为一个曲折复杂、变幻万千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心理可以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它也深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在终极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受到社会生活的决定。这样，当我们观察中国当代社会心理时，应该充分意识到社会生活本身对它的巨大影响。本章要做的工作便是考察当代社会生活如何在官员心理中得到反映，或说，官员心理如何受到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最大的潮流无疑就是变革，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层面进行的改革开放。这是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官员心理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上的活因子。这也是本章要考察的内容。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对 官员心理的影响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政治，从政治制度到政治功能再到具体的政治运作都发生了深层次、大规模的变迁。这也就是我国持续二十余年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深刻影响了中国官员的心理状况，使之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前的面貌。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我国当代政治变迁的过程和内容，然后再考察一下这一变迁和官员心理的关系。

一、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简说

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是从 1978 年开始的。在此之前，由于我党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动乱的影响，使我国政治领域中积累了大量弊端，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在这一年年底，我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从这时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政治领域的这些弊端，并开始探索消除这些弊端的方法。在其后的十余年里，邓小平等人曾多次就政治改革问题做出指示，推动着我国的政治变迁不断前进。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的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也就政治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广泛的实践。

在我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引下，我国和我党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民主集中制的恢复（比如，1980 年 2 月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央领导体制的改革（比如，1980 年 2

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干部退休制度的实行(1982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各项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制订(比如,于1979年制订了我国第一部刑法,于1982年和1988年两次修改了宪法)、党政企的分权(比如,1982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等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除了80年代各项措施的推广和深化之外,还执行了新的人事考核制度(1992年9月该项制度出台)和公务员制度(1993年10月开始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推动了政府机构改革(将中央政府机构40个部委精简为29个,人员分流一半,各级地方政府也同样进行精简)、实行“一国两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收回香港、澳门的主权后仍然维持了当地的社会制度)等。有人将我国八九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归纳为七大成就: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二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是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改革进展顺利;四是人事制度已经基本摆脱了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开始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人事管理制度;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初具规模;六是对党政干部廉洁自律有了明确规定;七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体制进一步加强^①。应该说,这种归纳虽然未必全面深刻,但还是有道理的。

结合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我国已经进行的制度变革,再联系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些变革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将我国二十年来政治变迁的内容概括为下面几点:一是创新因素的大规模出现和多层次展现。我们说,同改革之前相比较,今天在我国政治生活各个层面上(从规章制度到现实功能、

^① 戴舟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第三卷,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7—2910页。

从人事结构到具体运作)都充满着崭新的质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的因素在质和量上都远远超过传统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鼓励创新的这种机制已经大致形成;二是公正程度的提高。实事求是地说,今天中国政治领域的确比改革前公正多了。虽然至今仍然有人不满意,但公正程度的提高是任何人都不容抹杀的事实,而且这一提高还在持续;三是平等因素的增加。在改革之前中国政治领域存在各种各样或隐或显的等级现象、特权现象,在最近二十多年中,这些等级现象大部分被消除了,与此相伴随,中国政治生活增加了相当多的平等因素。而且,这些平等因素都通过制度的形式得到确保;四是理性成分的增加。坦率地说,改革之前在中国政治领域中存在着许多不理性的因素,大炼钢铁、“大跃进”之类都是其体现。改革之后,我国政治生活中理性程度越来越高,各级官员的知识素养得到很大的提高,能够较为理性地处理各种问题了;五是民主成分的增加。我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消除集权专制的体制和做法,发扬党内外民主。在这二十多年的改革中,这一目的正在一步步实现,我国政治生活中民主成分在逐渐增长。从基层官员的选举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都在民主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六是法制成分的增加。改革之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极为薄弱,有时甚至将领导人的话当作法。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制订、修改了大量法律、法规并在整个社会推行,使我国的法制化程度得到极大的加强。我们说,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可以从多个方面予以总结,因为这一变迁是在多个层面进行的,而从总体上说,这一变迁实际上就是在较为传统的政治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模式。

二、当代政治变迁和官员心理交互作用

作为二十余年中国政治变革的参与者,中国官员阶层深刻地影响了这一过程,同时也深刻地受到这一过程的影响。这一过程在官

员的心理世界中打上深深的痕迹，使之从一种较为传统的心理状态转变为具有现代内涵的心理状态。同时，中国官员也以自己的心理力量有力地参与且推动了这一过程。下面我们想要考察的便是中国当代政治变迁和官员心理世界的关系。

一般而言，个人心理可以分为知、情、意三个层面，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关系。不过，在这三者之中，认知应该是核心和关键，情感和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认知。与此相对应，群体心理也可以分为知、情、意三个层面，群体认知也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群体情感和群体意志，而群体情感和群体意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体认知。这样，当群体内部存在各种不同的认知、尤其是当它们相互冲突时，群体情感内部则会有各种分裂和歧出，群体意志也因内耗而变得脆弱和无力。反之，当群体内部形成了共识，群体情感和群体意志则会得到强化。对于官员心理和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关系，我们便从这些思考中予以把握。

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和官员心理层面的关系较为复杂。从直观的方面来看，在政治改革的开始阶段，一部分官员的认知转变为这一群体整体的共识并开启了这一变迁。我们知道，中国官员群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存在对于社会发展不同的看法，因而对于当时的方针政策持有不同的态度，其中所谓的“左派”积极地拥护，而所谓的“右派”则不甚赞同，大部分“中间派”则感到迷惑不解。由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一批老干部被打倒，这些认知分歧在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了，实际上这种分歧仍然顽强地存在且在增强。“九一三”以后，官员中的认知分歧甚至影响到社会大众，使广大人民看清了官员之间的分歧，并形成了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观点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官员群体内部对于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凡是”派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做法，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老一代革命家则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方针。